

韦 韬 陈小曼◎著

父亲一生结交的朋友可谓多矣，

上自社会名流，下至普通百姓，

父亲都是平等坦诚相待。

他蔑视阿谀奉承、藏奸耍滑之辈，

斥之为小人。

他也以此衡量他所结交的朋友。

我的父亲 茅盾



茅盾(1896年7月4日—1981年3月27日)，原名沈德鸿，字雁冰。

汉族，浙江嘉兴桐乡人。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和文化活动家以及社会活动家，
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和革命文艺奠基人之一。**

茅盾故乡的地域与人文环境，成就其勇于面向世界的开放的文化心态以及精致入微的笔风。

他是现代文学“社会分析派”的典型代表作家。

辽宁人民出版社



韦 韬 陈小曼◎著

父亲一生结交的朋友可谓多矣，

上自社会名流，下至普通百姓，

父亲都是平等坦诚相待。

他蔑视阿谀奉承、藏奸耍滑之辈，

斥之为小人。

他也以此衡量他所结交的朋友。

我的父亲 茅盾

©韦韬 陈小曼 20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父亲茅盾 / 韦韬, 陈小曼著. —2 版.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1.5
(父辈丛书. 文化名人系列)
ISBN 978-7-205-07068-7

I. ①我… II. ①韦… ②陈… III. ①茅盾(1896~1982)—生平事迹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71967 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321 (邮 购) 024-23284324 (发行部)

传真: 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http://www.lnpublish.com.cn>

印 刷: 沈阳市新友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70mm × 230mm

印 张: 19.75

插 页: 1

字 数: 300 千字

印 数: 1-3000

出版时间: 2011 年 5 月第 2 版

印刷时间: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陶 然

装帧设计: 丁未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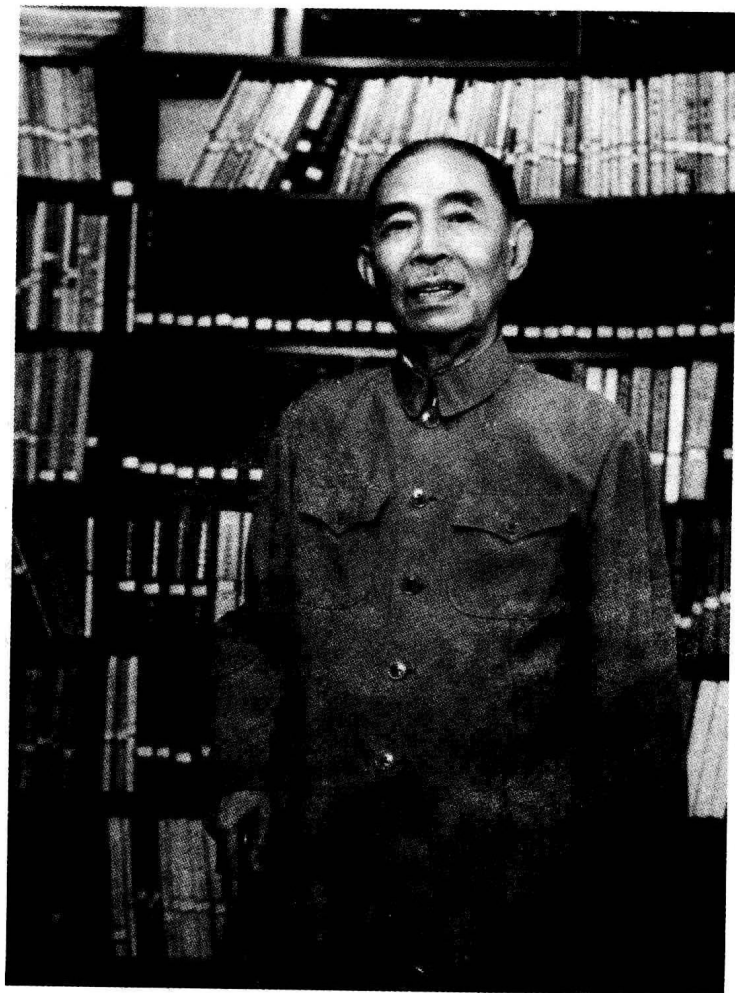
责任校对: 王 铮

书 号: ISBN 978-7-205-07068-7

定 价: 36.00 元



▲塑像



▲茅盾在书房。

前 言

2002年，辽宁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文化人子女回忆父辈的丛书，定名为“父辈丛书”，当年8月出版社便约我们撰写其中的一册，即《我的父亲茅盾》。我们觉得出版社的这个创意很有特色。

几年前，我们曾写过一本《父亲的晚年》，但书中记述的仅仅是父亲晚年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环境中的经历，远不足以反映父亲八十余年风风雨雨的人生历程。所以写一本回忆父亲一生经历的书一直是我们的心愿，也想弥补一下《晚年》一书的缺憾。于是我们便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

但在提笔撰写时，不免有些惶恐，因为在父亲逝世后的这二十余年间，茅盾传记、茅盾评传等等著作已出版了十多种，它们都有各自的特色。这些传记的作者都是茅盾研究的专家和学者。我们只能另辟蹊径，以子女的独特视角来写。

我们决定从四个方面来回忆和介绍父亲的一生，即政治生涯、艺术追求、亲情友情和人格情操，每一部分又分若干独立的情节和故事。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读者所看到的茅盾，不仅是位作家，还是个孝顺的儿子、体贴的丈夫、可靠的朋友、可亲可敬的父亲和祖

父。但我们这支拙笔仍未能较全面地反映这位为我国的进步文化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的老战士的精神风貌，这是我们感到愧疚和遗憾的。

在书稿初步完成之后，我们有幸得到编辑出版界的老前辈王仰晨同志的热心帮助，对书稿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审订和润色，使书稿增色不少。在此，我们向仰晨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现在这本小书已奉献在读者面前，它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只有等待读者的评判和认可了。

此次再版，又将书稿重新审阅，做了几处改正。

韦 韬 陈小曼

2011年4月

目 录

前 言	韦 韬 陈小曼
-----------	---------

第一章 父亲的政治生涯	001
一、父亲教我唱《国际歌》	001
二、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005
三、“妇女问题专家”	010
四、领导商务印书馆大罢工	016
五、大革命的风云变幻	023
六、斗争的艺术——原则性与灵活性	032
1. 30年代的“左冲右突”	032
2. 新疆脱险	037
3. 与国民党“中统”周旋	043
七、面对政治运动	050
八、十年沉默	056
九、一生追求的最大荣耀	067

第二章 父亲的文学追求·····	072
一、初闯文坛·····	072
1. 从翻译起步·····	072
2. 青年文艺评论家·····	075
3. 编辑界的闯将·····	077
4. 多面手·····	084
二、文学研究会主将·····	088
三、描绘历史画卷·····	100
四、现实主义的倡导者和捍卫者（上）·····	118
五、现实主义的倡导者和捍卫者（下）·····	129
六、辛勤的园丁·····	144
七、圆 梦·····	157
第三章 父亲的亲情·····	172
一、一位伟大的母亲·····	172
二、风雨同舟的伴侣·····	183
三、手足情深·····	195
四、对儿辈的歉疚·····	204
1. 一颗未出膛的子弹·····	204
2. “放羊”长大的儿子·····	213
五、含饴弄孙·····	222
第四章 父亲的友情·····	245
一、战友鲁迅·····	245
二、诤友瞿秋白·····	255
三、执友郑振铎·····	262
四、密友叶圣陶·····	266
五、契友胡愈之·····	270

第五章 父亲的人格魅力·····	276
一、团结至上·····	276
二、平等待人·····	284
三、远离特权·····	292
四、节俭持家·····	297

第一章

父亲的政治生涯

一、父亲教我唱《国际歌》

从我记事之时起，到我背上书包上学的那一年，约有四五年罢（那时我们住在上海），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和母亲（孔德沚）是整天忙忙碌碌。母亲晚上还能见到，因为带我睡觉；父亲则很少见面，白天一早就出了门，晚上回家又关在书房里写文章，那时我早已睡着了。所以，我和姐姐的幼年是在奶奶的教养下度过的。奶奶知书达理，记得在我四五岁的时候，奶奶就给我和姐姐讲《西游记》了，她是把书中的故事用孩子们能理解的浅近的语言讲给我们听的。

在那几年中，父亲还多次离开上海，去了广州，去了武汉，还去了日本，少则半年，多则两年。其中去武汉那次是和母亲一同去的。我长大以后才知道，父亲去广州是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与母亲同去武汉是参加1927年的大革命，而去日本则是为了避难——躲避国民党政府的通缉。

父亲教我和姐姐唱《国际歌》是在1927年夏季，母亲和父亲先后从武汉回到上海之后。那时，父亲突然改变了过去天天不落家的“毛病”，整天呆在三楼的书房里写东西，足不出户，使我十分诧异。这段时间大约有一年。在这一年我和姐姐能与父亲经常见面甚至有了与他亲热一番的机会。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教会了我们唱《国际歌》。他和母亲都不是音乐爱好者，严格地说，他们缺乏音乐细胞，还有点五音不全。在他们去武汉之前，我从未听他们唱过歌，只听见父亲独自吟哦过古诗文和母亲教我们念的童谣。

起初，父亲并没有教我们唱《国际歌》，而是在房间里独自低声吟唱，母亲有时也和着他唱，父亲还常纠正她唱错之处。我和姐姐在一旁听多了，也就学会了，有一天我们就当着父亲的面唱起来。父亲又惊又喜，夸我们聪明，便认真地一句一句教我们，还讲解歌词的意思。我们自然似懂非懂，只明白了一点，即全世界的奴隶们要起来打倒资本家，最后要实现“英特纳雄耐尔”，但什么是“英特纳雄耐尔”，还是不明白，只觉得这个东西很神圣，连父亲都崇拜它。

父亲从武汉大革命的熔炉回到上海，是带着因大革命失败的创伤、悲痛和消沉回来的。为了躲避国民党的通缉和迫害，他蜗居斗室近一年。但是，从我们孩子们的眼里看来，父亲的变化却在另一方面：他变得可亲了，变得慈祥了，而且变得会唱歌，会唱不少很好听的歌了。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沉重的日子里，父亲隐居在家中却引吭高唱《国际歌》，这大概展示了他当时精神状态的另一面，正如他在晚年回忆那段历史时所说：“一场大风暴过去了，但引起这场风暴的社会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所以革命是一定要起来的”！（《茅盾全集》34卷392、393页）

也许有人会奇怪，为什么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你们一家老小竟敢在家中高唱《国际歌》？难道不怕杀头！但真实情形就是如此，我和姐姐大声唱《国际歌》，父母亲从不干涉。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母亲才不让我们高声唱《国际歌》，但仍旧允许我们小声唱，只是不要当着外人唱，也就是说，唱这支歌是我们的家庭秘密，不能外泄。那时



▲1925年春茅盾和孔德沚在上海留影。

候，我们已经知道，这支歌是共产党的歌，唱这支歌被国民党、蒋介石知道了，是要坐牢、枪毙的。现在想来，在1927、1928年，蒋介石刚刚在南京站稳脚跟，正忙于与北方军阀内战，还顾不上建立严密的特务机构，警察和宪兵在“宁错抓一百，不漏掉一个”的命令下，抓共产党还算“内行”，但对什么是《国际歌》却一窍不通，即使对着这些蠢货大唱《国际歌》，也不会有危险。可是到了30年代初，情况就不同了，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基本上已经巩固，军警宪特的“知识水平”也大有提高，所以母亲不再让我们大声歌唱《国际歌》了。父亲除了教我们唱《国际歌》，还教了其他几首革命歌曲，其中有一首《少年先锋队歌》，也是我至今尚未忘记的，记得开头两句是：“走上前去呀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这首歌使我知道了人与人之间的称呼还有“同志”这个词，并且觉得它特别亲切。

后来我们长大了，才发现父亲教我们唱的《国际歌》有些音符唱错了。这不奇怪，试想，一个音乐的门外汉，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居然学会了唱歌，而且一发而不可收，这可是一个奇迹，唱错一两个音符不足为怪。这件事也使我从另一个侧面勾勒出一幅1927年大革命的如火如荼的画面。

从父亲教我们唱《国际歌》开始，我和姐姐在父母亲潜移默化的熏陶下，渐渐地树立了一个最基本的观念：共产党是好人，国民党、蒋介石是坏蛋。后来从母亲嘴里我们还知道了父母亲曾经都是共产党，陈独秀和毛泽东还是父亲的朋友。又知道叔叔沈泽民、婶婶张琴秋也是共产党，叔叔还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可惜刚三十三岁时就牺牲在鄂豫皖苏区了！

1940年，父母亲把我和姐姐带到延安，让我们参加了革命。那时我发现，父亲在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有许多朋友和熟人，可见他当年在共产党内是相当活跃和很有人缘的。可是几十年来，他从未向我们谈论他早年的这段经历，对他曾是共产党员就更讳莫如深，我们只是偶尔从母亲口中听到一些片段。一直到了父亲的晚年，在“四人帮”大施淫威，任意篡改历史颠倒黑白的时候，父亲才突然宣布：要把他

早年的经历写出来，“还历史一个真面目”，并向我和孩子们详细讲述了他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那时我才知道，父亲原来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二、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1916年8月，父亲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来到了十里洋场的上海，进了商务印书馆。那年父亲二十岁。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张元济在接见父亲时，发现父亲的英语程度不低，就把他分配到编译所的英文部任初级编辑。一个月后，因父亲对商务新出版的《辞源》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得到张元济的赏识，认为父亲在英文部是“用非其材”，就调他到国文部给版本学家孙毓修当助手。在孙先生的手下，父亲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译完了一本25万字的通俗读物《衣、食、住》，又编了10万字的《中国寓言初编》，还为商务出版的《学生杂志》翻译了一篇英国科幻小说家威尔斯的小说《三百年后孵化之卵》。于是又被《学生杂志》主编朱元善看中，硬把他借了去，协助朱编杂志，写社论和翻译科普小说。

父亲最早的两篇论文《学生与社会》和《一九一八年之学生》，就是发表在《学生杂志》上的。在这两篇文章中，父亲提出了青年应该追求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担当宇宙之志，……尤须有自主心，以造成高尚之人格，切用之学问。有奋斗力以战退厄运，以建新业。”又提出青年要有“革新思想”，“即力排有生以来所熏染于脑海中之旧习惯、旧思想，而一一革新之，以为吸收新知新学之备。”当时父亲还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他的思想认识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畴，但他的勤奋、进取心和思想的解放，已在商务印书馆那一泓死水中激起了一个小小的涟漪。

助编《学生杂志》，使父亲有机会从杂志编辑部订阅的书刊中第一次读到了《新青年》，从而大大地打开了眼界。《新青年》提倡民主与科学，主张平等自由、人格独立、个性解放，抨击旧礼教、旧思想、

旧文化，把国家的振兴和社会改造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这种观点，正和父亲的思想相吻合，而且从理论上作了更深的阐述和提高。因为这些理论多来自西方，于是又激起了父亲从西方各种思潮中寻求真理的欲望。在这样的探求中，终于使他把关注点集中到社会主义上来，其中就有马克思主义，但起初仅仅是把它作为当时各种政治学说之一来研究的。

父亲实行“拿来主义”是有原则的，即可以“佩服”但不盲从，借鉴是为我所用。当时他对尼采的学说，罗素鼓吹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都做过细致的研究。他采用一分为二的研究方法，既赞成其合理的内容，又扬弃其错误的观点。经过鉴别才能比较，从比较中再择取真理，经过苦苦的探索，父亲终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父亲走向马克思主义，除了来自自身对追求真理的渴望，还有赖于三个外在的因素：其一，他听到了十月革命的炮声和读到了李大钊

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庶民的胜利》；其二，五四运动的爆发大大激励了他的“参政”意识，开始积极、大量地撰写文章，探讨主义，议论时弊，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在报刊上共发表了论著和译文近90篇；其三，与陈独秀建立了联系。

在这里，需要专门提一下张东荪。张东荪是梁启超的弟子，属于“研究系”，当时是《时事新报》和《解放与改造》的主编。五四运动后，他在新思潮的推动下也开始研究社会主义，并且和陈独秀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1919—1927年

一度与陈合作拟发起和组织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父亲那时撰写的研究社会主义的论文和翻译的小说和剧本，大半发表在《解放与改造》和《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上，因此就与张东荪由结识、熟悉而成为朋友。张曾约父亲写过一篇介绍罗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的长文，还请父亲代他主编了几个星期的《时事新报》。

1919年五四运动后，《新青年》内部发生了分裂，陈独秀主张在《新青年》上谈政治，宣传马克思主义，以胡适为首的一批北大教授则对此持反对态度。陈独秀一气之下，便决定把《新青年》移到上海来出版。到上海后，陈就约见在沪的朋友，商量如何在沪继续出版《新青年》。张东荪在被邀之列，他擅自把父亲也带了去，这是父亲第一次见到陈独秀。这次会面，父亲还结识了陈望道、李汉俊、李达和戴季陶，他们见到父亲都表示早就闻名并读过你的文章，想不到还那么年轻，真是后生可畏等等。其实，除了陈独秀，其他几位当时都不过三十左右，比父亲大不了几岁。这次会面，使父亲从此进入了陈独秀的圈子，加速了他的思想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化和深入。

就在父亲努力探索社会主义的同时，他和叔叔沈泽民于1919年7月，联合了家乡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和客居在外的学生，在家乡乌镇发起组织了一个政治性的社团——“新乡人社”，其宗旨是反对封建，提倡科学，改革社会，宣传民主，并出版了社刊《新乡人》，由父亲任主编。这是父亲的第一次“参政”活动，他既是组织者又是领导者。“新乡人社”活动了三年，除了出版社刊，还在家乡青年中组织过一些讲演会、讨论会等活动。到1922年，“新乡人社”已发展到五十余人，并更名为“桐乡青年社”。那时父亲与叔叔已经是共产党员，就有意想把“桐乡青年社”的纲领从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但那时会员的成分已相当复杂，其中有一大部分人不同意社会主义，最后不得不分道扬镳，“桐乡青年社”也就此解体了。这是父亲早年的一次“不成功的”政治实践。

1920年5月，改版后的《新青年》出版了，公开打出了介绍、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介绍十月革命、研究苏俄的旗帜。由于原来的一批